

实践、包容与开放的“中式服装”(下)

周星

(日本爱知大学 国际中国研究中心, 日本 爱知 453-8777)

摘要:“中式服装”是在近代中国建设国民国家的伟大历程中,相对于“西式服装”而定义的。“中式服装”的范畴具有实践性、包容性和开放性。“中式服装”这一范畴在中国社会及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反映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广大民众服装生活的穿着实践和政治及知识精英的创制建构实践,以及所有这些实践均指向旨在确立中国文化主体性认同的方向。“中式服装”的创制、建构和延展,是一个反复试错和持续推进的过程,这个开放的过程将多种的创制实践都包容进来,从而形成了非常丰富的内涵。在对“中式服装”范畴的复杂性和包容性以详细解说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式服装”在中国社会及文化中即将获得的更加丰富的可能性。

关键词: 中式服装; 实践; 建构; 汉服运动

中图分类号: TS 941.7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1928(2018)03-0247-09

Practical, Inclusive and Open "Chinese Garment" (III)

ZHOU Xing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Aichi University, Aichi 453-8777, Japan)

Abstract: The definition of "Chinese costume" is relative to "western costume" in the great course of modern China's construction. The category of Chinese costume is practical, inclusive and open. "Chinese costume" has very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t reflects Chinese costume life in practice and the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elites, and all the practices are pointing to the direction of subjectivity aiming to establish the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The initiative, construction and extension of "Chinese costume" are a process of trial and error and continuous advance. The open process includes various creation practices, and therefore forms a very rich connotation. Further the current and future possibility for "Chinese costume" to obtain more in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were discussed, after the detailed explanations of the complexity and inclusiveness of "Chinese costume" category.

Key words: Chinese costume, practice, construct, Han suit movement

(上接第3卷第2期)

8 “汉服”重现:大规模的草根文化实践

在“新唐装”大规模流行,一时间好评如潮的同时,反唐装,进而反旗袍的“汉服运动”却在悄然兴起。2002年开始于网络社区的对于汉族民族服饰问题的追问和大讨论,既有具体地缘起于部分网络民族主义极端言论的各种刺激的直接反应,也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浪潮中面

临进一步流失困境危机感的反应。汉网成立于2003年元旦前后,其创始人之一是任职于北京一家出版单位的李敏辉(网名李理),他也是最早在网络上倡导汉服复兴的人之一,曾任汉网管理员和新闻发言人。据他介绍,其实是受到其他民族主义网站(如满族网)中有关民族主义的言论刺激才兴办的汉网。曾从事地方外事工作、现已退休的汉服运动民间理论家宋豫人,提及他是受到外宾对国人把西装礼服当作日常便服所做酷评的刺激,才开始参与汉服及“汉礼”的复兴运动,同时他也表示“我们不

收稿日期:2017-12-10; 修订日期:2018-01-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AG004)。

作者简介:周星(1957—),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学与民俗学。Email:zhouxing@vega.aichi-u.ac.jp

能只做填表的汉族”。不少人在论证汉服复兴合理性和正当性时,把唐装、旗袍视为抵制的对象,它们被用来反证汉服的正统性。对于清初统治者曾经强迫“易服”历史的悲情陈述,以及对于汉族民族服装缺失现实的强烈不满,都构成了“汉服”正当性的强有力理据。

显然,汉服运动一开始实际上就有两个基本面向:一是面向国内多民族格局下汉民族服装的缺失;二是面向国际社会场景下中国自我形象的焦虑。对于前者而言,寻求汉服作为民族的认同纽带或情感寄托一般不应被视为是狭隘的民族意识^[1],问题只在于它有时候可能会带来排他性或导致某些误解。至于后者,现代化、全球化、西化所带来的文化认同焦虑,反映在“我们懂得民主自由,却忘了伦理纲常;我们拥有音乐神童,却不识角徵宫商;我们穿着西服革履,却没了自己的衣裳”之类的表述当中。显然,这是对过度西化和盲目追逐西方时尚社会风潮的一种文化反驳^[2],问题在于它有可能对改革开放条件下正常的国际文化交流导致文化越境现象过度敏感。汉服运动的兴起及发展也与海外华侨、留学生的努力密不可分。据杨娜等汉服运动实践者的介绍,海外汉服活动相较国内阻力要小,各国人士均善意欣赏中国年轻人的举动,不像在国内常遭遇白眼或冷嘲热讽^[3]。这主要因为海外场景很容易让人在汉服和中国民族服装之间实现概念的转换和想像的连接,从而使上述两个面向趋于合一。因此,海外汉服活动与其说是复兴汉文化,不如说是表达爱国主义和展现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汉服”是现代汉语中的一个新词,“汉民族的传统服饰”这一表述是由网络汉服社区的居民(网友、同袍)共同完成的民间或草根式定义,但也得到了一定的学术支持。张梦玥较早讨论了汉服的观念^[4],她的定义和言论虽然具有本质主义的色彩,但对在当代社会复兴汉服的主张却较为温和。她把“华服”、“唐装”等词汇视为对汉服的旧称,认为提倡汉服不是让人们日常穿着,而是在节日庆典、重大仪式上让中国人、华夏汉族有自己的服饰。她的见解在汉服运动中较有代表性,但也较难达成共识,因为努力让汉服回归日常生活是另外一些同袍们的终极目标。

通过实地观察,受推崇的汉服形制是:男性以交领右衽、大襟阔袖、衣裳相连、宽袍大带为特点;女性服饰或是大襟、右衽、交领,以秦汉时的曲裾深衣为样本,或是隋唐兴起的大襟低胸襦裙,或是上

衣下裳。根据张志春教授的解释,汉服运动之所以较多地选择“深衣”作为汉服的基本形制和主流样式,是因其在古代为士大夫即国家栋梁的服饰。汉服的某些款式细节是绝不可以让步的,例如右衽^[5],但有些细节则可以变通。对于汉服的赞美,主要以悠远性、连续性、纯粹性为基本言论。通常,汉服运动理论家们对于服饰文化的族际互动、融合和相互影响的历史,特别是受到胡服影响的部分,要么不予重视,轻描淡写;要么强调汉服有永恒不变的本质元素;或把极其复杂的中国服饰史简化为汉服史,再把汉服史简化为“秦汉为裾,隋唐作裙,宋着褙子,明穿深衣”。汉服被认为表现了汉民族的性格,诸如柔静飘逸、娴雅超脱、泰然自若,或平淡自然、含蓄委婉、典雅清新等,同袍们用来描述汉服的词汇,反映了他们的本质主义理解,与对华夏汉族的本质主义界说互为一体。特别是在华夷对举或中西并置的场景下,汉服的标签、符号性意义就会更加凸显。有研究者批评说,汉服其实就是虚构的一种“图腾”,在有些汉服论说中它甚至成为族裔或种族血统的标签,进而沦为种族性的民族主义^[6],甚至有时候这种血缘认知还能部分地反映于相关的社会实践当中^[7]。

虽然汉服言说和汉服运动的理论具有浓厚的本质主义色彩,但并不妨碍汉服同袍们在其户外服装活动中以各种策略、举措和方式所进行的变通及其建构主义实践^[8]。本质主义的汉服陈述或言说表象,容易形成某种排他性,致使汉服运动与周围服装生活现实之间形成鲜明对峙;建构主义的穿着实践促成了汉服的多样性,它在使汉服运动内部充满活力的同时,也导致人们难以形成共识。虽然有不少人执著于对汉服文化纯粹性的想像,但在现实中却不得已或有意识地采取了建构以及容许建构的行为。据“当代自制汉服第一人”王育良讲,他是一边参照古代比较典型的式样,一边猜想“瞎做的”,制作汉服把华夏最美的精神内涵表现出来即可;据“穿着汉服上街第一人”王乐天讲,“穿汉服时坐姿走姿都要端起来,能感受到一个汉族人的尊严”^[9],但他的汉服其实是通过互联网向网友阿秋定做的,阿秋则是依据电视剧《大汉天子》中李勇(原型李陵)服装的样式仿制。武汉的阿秋(邱锦超)从2003年11月开始制作汉服,是起步较早的一位职业汉服制作者,其理念是制作汉服既要坚持基本元素不变,尽量符合古制,但又应该有时代性,结合现代人的审美,在纹饰、颜色等方面做一些探索。阿秋开了一间汉服制作工坊,经王育良取名为

“古径衣饰”,在“圈内”颇有影响。

有趣的是,在现实的汉服建构活动中,还逐渐出现了利用汉服表达地方文化身份的动向。例如,开封的网友就曾设计过开封庙会的“宋装秀”倾城计划^[10],欲让市民都穿“宋服”上街,地方政府也以“梦回宋都”为主题,试图把开封建成全球最大的复古主题公园。在西安,汉服活动更加青睐秦汉或隋唐时代风格的汉服,因古城西安的历史文化资源在此方面有明显优势。2010年11月6日,在西安首届服饰民俗文化与文学学术研讨会上,曾经有一份《汉服宣言》提交与会者讨论(后因意见分歧而未能公开发表),该宣言呼吁在即将到来的2011年4月第41届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上的礼仪小姐应该穿汉服。主办人说汉服是以西安为发源地,故应该用汉服作为汉长安城国家遗址公园的礼仪服饰,事实上,西安不少汉服同胞也都坚持认为西安乃汉服发祥之地。

全国范围内积极参与汉服运动的社团领袖和骨干积极分子,人数大约近千人,他(她)们大都是80后或90后、00后,以在校大学生和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居多。最早于2003年初创建汉网时,仅有4~5位年轻人。据曾任汉网管理员的李敏辉介绍,前来汉网讨论相关问题的主要有两种人:对汉文化本身有浓厚兴趣的人;无意间浏览汉网,受到影响后,也成为汉服或汉文化爱好者。这些年轻人的特点是有一定的教育背景,对国家、民族有认同感。大多数汉服运动的穿着实践者都有一些理想主义^[11]。颇为活跃的汉网网友、吉林大学在校生欧阳雨曦曾在汉网发布过《汉服初步分类规划制定方案(草稿)》,试图为汉服款式确定一套现代标准,但这类努力显然并不符合汉人历史及现实中所采用服饰极具多样性的基本事实,然而她的努力本身明显地说明了汉服确实是在当代被建构出来的。她把复兴汉服的理想视为对物质主义的逆反,认为现代人太重实利,精神空虚、归属感缺乏,故以汉服作为振兴中华文化的依托,使很多人因此感受到精神上的充实。

汉服在各地社团的户外(线下)实践中出现了突出的“祭服化”倾向,无论是特意设定的祭祀历史上汉族名人或英雄的活动,还是在开笔礼、成人礼、婚礼等诸多人生仪式的祭祀环节,抑或是在清明、端午、七夕、重阳、冬至等许多传统岁时节日举行的汉服活动中的祭祀性段落等。反复和频繁地举行各类祭祀不仅为汉服提供了出场的必要性,也为汉服增加了庄重感。与此同时,这些穿着汉服举行的

祭祀仪式,还为所谓“汉礼”的复兴提供了展演实践的路径和形式。这些仪式往往被宣扬是对于古代礼仪的“复原”,例如,在西安大唐芙蓉园仕女馆举办的“丁亥年汉服文化活动”中的女子成人礼(笄礼),但正如此次仪式上祭拜轩辕黄帝所意味的那样,它们也属于当代的创意和建构。祭祀活动可为汉服出场平添某些氛围和神圣性,也能为很多同胞提供其日常生活里久违的仪式感,但其实祭服在现场,无论是色彩、风格还是款式形制,总是呈现出五花八门、多种多样,难以统一的现状。

很多汉服同胞们热衷于在当代复兴的“古礼”,原本就是暧昧不明的,其意义内涵也不清晰。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断断续续、绵延上千年的“古礼复兴运动”,历代的儒生们始终把朝廷“冕服”视为可以表象古代礼制体系(以周礼为典型)的诸多“象征符号群”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故对其格外纠结,且纠缠不清。他们天真地相信,如果能够人为地规划出一套完美的服饰礼制制度,或许就可以实现他们所理想的社会。阎步克教授曾将这种历代的纠结称之为“礼制浪漫主义”^[12],而如今的汉服运动也可以说是此种“礼制浪漫主义”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新生的一个变种。

汉服的穿着实践者们对于汉服的现代定位有两个基本主张:①把它作为礼服,即礼庆着装。此种礼服论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它的困难在于究竟是确定礼服的统一款式,还是维持其多样性的格局。从最少受到抵触的汉服婚礼的实践来看,无论明式、唐式^[13],还是周式,汉服作为婚礼礼服已被证明是基本可行的,但在实际运作的具有汉服元素的婚装展演上,可看到其时装性仍有可能超过它作为汉服礼服的属性^[14]。和礼服论纠缠不清的是对于汉服“古制”的纠结,亦即对于纯洁性和正统性的追求。②希望能够在现代的日常生活里也穿汉服,亦即努力使汉服运动脱离少数人“行为艺术”的印象,而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常服。常服论的主张虽然较为激进,似乎很难一蹴而就,但它却往往对汉服持较为灵活变通的姿态,认为只要维持了汉服的基本元素,其他的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变通和改良,这意味着常服论其实是能够和汉服改良论相互通约的。此外,还有汉服时装论,亦即汉元素时装的新理念。从《华夏衣冠》等电子杂志的定位来看,其对汉服的时尚性并不排斥。有人主张汉服原本就具有流行性的特点,因此,不应把它简化为只是一件交领右衽的衣裳^[15]。北京网友紫姬曾经自行设计出下摆襦裙、上衣配坎的便利性汉服,穿着它上

下班,证明汉服现代化是可行的,以及所有的汉服元素都可以融入现代设计。欧阳雨曦曾经搜集整理过网友们穿汉服时的感受,其结论是经实践的检验:在基本符合汉服原型的前提下,即便在当代日常生活中穿着汉服也没有什么不方便。

十多年来,汉服运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较大规模的草根文化运动,与此同时,它的内涵也日趋复杂。汉服理论家中既有执著于古代形制的考据派,也有致力于扩大汉服在日常生活中存在感的现实派,即主张将汉服改良之后穿用于当代。一般来说,前者反对商业化,后者则主张商业化,但最大的现实是“汉服商家”在汉服运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2009年10月8日,“苏州汉服研究所”宣布成立,其宗旨是将汉服广泛应用于民俗、影视和婚礼等多种场合。对于现实派而言,汉元素时装不仅可以接受,而且已经有不少同胞们正在践行;但在固执的考据派人士看来,所谓改良汉服可能已经背离了这个运动的初衷。

汉服运动所设定的目标是依托古代服饰文化资源而试图建构汉服,作为汉族乃至中国人的民族服装予以确立和普及。它对于唐装、旗袍的排斥是要促成一种抵抗性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即确定反对的目标而强化自身的认同,但问题是由此导致认同的实际状况较为混乱,究竟是汉民族的认同,还是中国人的认同,抑或只是作为亚文化的汉服“小圈子”、小社群的认同。作为一个互联网时代兴起的当代亚文化^[16],其所期待、期许的社会愿景,似乎是古代华夏——汉文明的当代重现;同胞们所想像的宇宙图式或社会秩序似乎是人人穿汉服,以汉族为主体、以传统的汉文化为最优越的“天下”乌托邦。

总体而言,温和的汉服运动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其理性发展能够被多民族的中国社会所接受。但也有一些较为极端的主张,认为确立华夏汉族、汉文化和汉家礼仪的正统性,要远远重要于在“中华民族”概念之下的包容性。例如,在“大河论坛”的“晕语集类”中,读者可以从宋豫人的兴汉理论中感到一种华夏文化的“原教旨主义”寓意,在某种意义上,其主张已接近于形成一种中国民间版的“文明冲突论”。

9 “新中装”:中式服装建构的又一轮尝试

2000年上海APEC推出的“新唐装”令人记忆犹新,14年后的北京APEC又推出一套“新中装”,

则令人眼前一亮,随后也是一时论者如云、好评如云^[17]。和14年前的“新唐装”命名一样,此次“新中装”的命名也是有若干说法作为依据,例如:说它是一系列旨在展示中国人新形象的中式服装,其根为“中”、其魂为“礼”、其形为“新”,三者合璧,才谓之“新中装”。

非常令人欣慰的是,在APEC会议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对此次首脑服装设计提出的思路或理念中,有“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西合璧,和而不同”之说,它来源于中国人类学家费孝通于1990年12月提出的旨在理解多元文化共生之世界格局的16字题词。以此为宗旨,则意味着为领导人设计的服装除了要强调和突出中国特色,还必须有包容、开放和融汇的姿态;既兼顾传统和现代,又兼容民族性和国际感,真正做到古为今用、中西交融。简而言之,就是既要“中”又要“新”,具体方针为:①“款式先行”:主要通过款式来实现上述设计理念;②“形成系列”:一次性推出一个系列,可以供穿用者有较多的选项;③“仪式感强”:明确它是作为礼服而非生活常服的属性;④“尊重个体”:亦即对每一位穿用者均量体裁衣,以表现其个性气质,彰显领导人的形象;⑤“推广流行”:对于预料之中的轰动效应予以延展,进一步推动中式服装文化的建设。

从2014年11月10日晚被称为是亚太大家庭“全家福”的合影来看,东道主为领导人提供的服饰,男性为对开襟、立领、连肩袖的款式,面料为提花万字纹宋锦面料,以及海水江崖纹的设计;女性为对襟、立领、连肩袖的款式,面料为双宫缎,外套饰以海水江崖纹。另为第一夫人们提供的服装,则是开襟、连肩袖的外套,内搭立领的旗袍裙。据说,为了体现和而不同的理念,实际上是为领导人及其配偶,提供了多套款式和颜色以供其自由选择。

事后出现的各种爆料或花絮,揭示了这一系列“新中装”的设计理念、创作过程,以及其中寄托的象征性言说。全国数百名一流设计师参与,历时近1年,经由层层甄选,主持其事的服装设计研发小组被认为代表了中国当下服装设计的最高水准。这一系列“新中装”被认为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意识和着装习惯,同时也有国际时尚的感觉。在他们看来,完全传统的汉服和中山装或不符合中国的主旋律,或已经不足以表达现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所以,才有此套“新中装”的推出。“新中装”的属性当然是“中”,它要显示中国服饰文化的精粹,故其款式据说是融合了历朝历代具有代表性的款式风格和要素:始于商代的开襟,盛于明清的立领和对襟,

以及最为古老的连肩袖等。也因此,它似是而非、似旧而新,让人无法判断究竟是依托了哪一个历史阶段的传统服饰。赞赏者们认为它是融汇了中国历代服装风韵和现时代之精神的特色“中式服装”。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证明这一系列“新中装”的独特、高贵以及具有中国文化之“本真性”的论证,包括对各种象征意义的附加和演绎。例如,把中国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宋锦作为面料,进而还有“和美绉”“天香缎”“天丽绸”“天娇锦”等,这些材质或者是100%的顶级真丝,号称最为环保;或者是用真丝和顶级羊毛交织而成。其次,强调其工艺的古老性、传统性和手工性。宋锦作为宋代的提花面料及图案的统称,本身就具备历史性价值;这一系列服装从制版到染色,据介绍全是按照传承下来的古法研制,且都由手工制成;海水江崖纹样,其中被寄托的寓意则是亚太各经济体山水相依、守望共荣。

在剪裁制作工艺上,和当年的“新唐装”一样,此次推出的“新中装”也是中西结合,既要表达中国服饰的意境,同时也要让穿着者感到合体与舒适;当然,还必须有所创新,据说把立领和对开襟相结合,就是对款式的创新,也因此,它被赋予了传统正装的感觉。和“新唐装”最大的区别在于,“新中装”没有采取垫肩装袖的类西服式剪裁,而是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连肩袖。和14年前的“新唐装”相对较多体现出传统服饰元素,以鲜艳和富贵的格调来彰显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有所不同,此次“新中装”较多地追求气度、高级和沉稳的格调,例如,在色彩上,特意选择故宫红、靛蓝、深紫红、孔雀蓝以及金棕色和黑棕色等,相对而言均是较为厚重和大气的色调。

但是,“新中装”和当年“新唐装”推出之后的社会反应几乎一致,也被认为是一次研制“国服”的设计探索,在它被隆重推出前后,照例引发了研究和讨论“国服”及相关问题的热潮。2014年10月25日,由多家机构和企业联合举办的“国服文化研讨与服装探索展示大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办,堪称是此类活动中较为重要的一环。但不同的是,“新中装”在普通国民中的反应却有些冷淡,远远不及14年前“新唐装”引起的强烈反响,“新中装”并未引发设计者们此前所期待的流行性追捧。在“新唐装”和“新中装”相继引发的国内舆论的反应中,总是被指向中国有没有“国服”,需不需要“国服”,为何需要“国服”,以及需要什么样的“国服”之类的话题。中国公共媒体和部分公众的“国服”情结,还时常体现为对于国家领导人在各种公开场合的着

装形象的格外关注。

2014年3月24日,中国媒体报道习近平夫妇访问欧洲,在参加荷兰王室22日的国宴时首次穿着“中式礼服”,说“世界为之眼前一亮,国人为之精神一振”。习近平所穿的“中式礼服”很像中山装,但不是紧闭的翻领,而是稍微敞开的立领,明门襟改为暗门襟,把四个兜改为三个,左胸衣兜露出黑底白色花纹的帕巾;中间一排中式绣花和领口、袖口的刺绣祥云暗纹图案等,更加凸现了它的礼服属性。彭丽媛则是身着立领粉青色中式长裙(旗袍),外搭凤凰百花纹样刺绣的黑色对襟罩衫。媒体将这套基本上是中山装稍加变通、改良的礼服“解读”为“既有传统风格又有现代元素,既有中国气派又具开放意味”,它传递的文化信息是:中式代表自信,变化意味着创新。甚至说中国网民为之欢呼:“新的国服诞生了!”进而还希望“中国各级领导人都应该穿国服”^[18-19]。或许是因为受孙中山曾开创的中国式“着装政治学”的影响,中国领导人的服装总是会被过度解读。1998年江泽民访问日本时身穿黑色中山装出席天皇的欢迎宴会,据说也曾被日本媒体解读为是要表达某种不满。

在2006年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期间,东华大学举办了一次主题为“我心目中的‘国服’”的服装设计大赛。大学生们的作品,远远超出服装界专家们的预期。在多数专家的心目中,“国服——着装的国家形象”其实已有一定的基础或被认为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诸如中山装、旗袍、唐装之类,抑或是多少汲取或融入了这些传统元素的创新服装。但实际上大学生们的作品却太过舞台化、时装化,甚至太卡通,而汲取旗袍、中山装等相关元素的作品为数甚少。举办此设计大赛恰好说明中国目前没有“国服”,年轻人心目中的“国服”也远远没有形成,哪怕是初步共享的印象。在设计比赛中获奖的边菲解释说,她之所以不把旗袍视为“国服”,是因为当代旗袍往往被作为酒楼饭店服务员的工作服,或是因旅游业需求而兴起的演出服,失去了原本的韵味。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却反证了旗袍的普及程度。然而,创制“国服”仍是长久以来很多人的梦想,从孙中山创制中山装,到江青短暂的尝试,还有两次APEC会议相继推出“新唐装”和“新中装”,以及眼下的“话题之王”——汉服运动,动不动中国舆论界就会有“国服论”出台^[20]。若把“唐”“华”之类范畴等同于“中国”,则唐装、华服就近似于“国服”,但若把长袍马褂甚至改良的马褂(唐装)定义为满装,它们似乎就不够做“国服”的资格。类似这样,

大部分涉及“国服”的讨论,要么只是概念的执拗或文字的游戏;要么是无视民众在生活实践中对于“中式服装”已经形成的默契或认知;要么是无视多民族中国之“国服”难产的问题并不在于“服装”的定义,而在于“中国”和“中国人”的定义。无怪乎曾有学者针对人民代表提议创制汉服式样的学位服,提出应该慎言“汉服”而多提“国服”^[21],因为“汉服”这一范畴存在歧义,用它作为学位服,少数民族学生未必认同。

关于“国服”的思想谱系,总是伴随“中式服装”的建构及其穿着实践。一方面,它和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服制”传统藕断丝连,倾向于通过服装来规范官员和人民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它又与中国作为现代(多)民族国家需要通过建设国民文化而不断地强化国家认同的需求密不可分。当然,还与积贫积弱的中国在奋进崛起的过程当中,一般人民和公共媒体均特别在意国家和国人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这一类特定的心理有关。不难理解中国人为何如此介意自己被国际社会所认知的形象,因为就在 2012 年的万圣节期间,仍有美国商家通过网络销售 20 世纪初西方人用以辱华的面饰,亦即所谓“傅满洲”的形象^[22]:红色及黄色的对襟中式上衣、带有“猪尾辫子”的各种帽子以及“八字胡”。作为族裔妖魔化的种族偏见符号,“傅满洲”的形象如幽灵般地游荡于百年之后的网络,这一例子便可以说明:西方世界关于中国人的刻板印象依然是中国公众在意民族服装或“国服”及其相关形象的部分根由。

然而,和国旗、国徽、国花、国宝之类的符号性建构不尽相同,“国服”在作为一个符号的同时,它还内涵或预设了对于人民服装生活的某种以国家权力为背景的强制性干预的可能性。假如某种款式的“国服”一经确定并被推行开来,中国就有可能由当下的“时装社会”倒退回曾经的“制服社会”。在穿衣戴帽早已成为个人所好的今天,为了推广某种“钦定”服装而期盼使用国家公器这一类“制服社会”的意识形态观念,委实值得深刻反思。西方历史上也曾有过动用最高权力推行“以民族服装来固化民族感觉”之类政策的情形,例如,在民族国家意识崛起的思潮中,德国的巴伐利亚王国的国王马克西姆二世曾在 1853—1857 年连续发布 3 道诏书以推广民族服装。当时,出自艺术家之手、具有审美价值的民族服装,其实是汲取了各地农民服饰的典型性特征,其样品挂图免费发放乡村,在公共活动室中展出;学校的节日或毕业考试等仪式性场合,

学生必须穿着;新婚夫妇应身着民族服装举行婚礼;在乡村的节庆竞技中优胜者的奖品也是民族服装等。但是,最终民族服装还是无法在日常生活中保留立足之地。今天,只有在表演性场合,才可以看到身着民族服装的人群,而街头的芸芸众生所穿戴的却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或许是出自某个中国服装加工车间的衣物^[23]。

10 讨论:重新定义中式服装,使之更具包容性

出于对“国服”概念政治性的回避,人们更倾向于认为“中式服装”概念的文化性,能够被用来更好地描述和概括有关中国人的民族服装在近百年来的建构史。同时,人们也尝试对“中式服装”予以重新定义,以便使它具有更好的可塑性和更为宽博的包容性。简而言之,就是在其与西式服装以及其他服装文化体系相互比较的语境或场景时,得以认可的具有中国文化属性和中国多民族服饰传统要素的服装,均可称为“中式服装”。假如未来的“国服”创制真的有可能成功,有学者认为,它应该是综合了中国各个历史朝代以及中国多民族的服装样式而全新建构的^[21],但在这样的“国服”成为现实之前,人们可以先拥有一个具有更大和更多容量的“中式服装”概念。1997 年在香港回归祖国之际,据说香港有媒体曾提倡市民在回归日集体穿“中式服装”;内地的服装文化专家袁仄等人亦曾致力于推动将某日确定为“华服日”(此处所谓“华服”并非汉服),号召民众在这一天都穿中式的传统衣服。但上述号召的响应者寥寥无几,说明中国社会对于此类问题或缺乏共识,或没有紧迫感。因此,在此重新定义“中式服装”概念时,主要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试图澄清一些概念和逻辑上的混乱。

如此的“中式服装”概念,自然可以将汉服及其所有相关的建构实践均包括在内,它也理所当然地包含着对于汉族传统服饰发展历程中存在“混血”这一基本历史事实的尊重,诸如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骑射”,北魏推行的包括服饰在内的汉化政策,盛唐兴起的圆领窄袖服饰曾经受到西域胡服的影响,民国时期的现代旗袍更是既汲取了满族旗装的某些特点,又大量地汲取了西洋的裁剪技艺等,但这些都不妨碍多样性“中式服装”范畴的成立。笔者认为,即便是过于追求文化的纯粹性而建构出来的各种款式的当代汉服,将其理解为“中式服装”亦顺理成章。显然,这样的规范有助于化解汉服运动内在两个面向之间的紧张悖论,从而摆脱相关的

文化逻辑困扰,亦即能够为汉服运动“解套”,为它找出一条光明的出路。不仅如此,汉服运动也因此获得非常积极的意义,因为它极大地拓展了“中式服装”的内涵,不仅为广大民众提供了很多可供想象和选择穿着的“中式服装”款式,还把历史上汉民族的所有服饰元素均纳入到当代“中式服装”创新或建构的资源宝库之中。因此,汉服运动为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式服装”的发展或建构实践已经并将继续做出重大贡献。

扩容的“中式服装”概念,当然也应该把民国时期经由政府通过“服制”的建设而促成的长袍马褂等传统“中式服装”纳入其中。像在台北一年一度的祭孔大典上,均着蓝色长袍的“主献官”“分献官”“陪祭官”,以及身穿黑色长袍马褂参加仪式、上行礼的地区领导人,他们的着装自然都是能够在“中式服装”的框架之内获得定位;抑或是各地民间从长袍马褂改良而来、比较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常服褂子和长衫礼服等,也都可以自动地获得“中式服装”的属性。虽然有人强调民国年间的长袍、马褂和旗袍均起源于满装,但在“中式服装”的框架之内讨论其族属的意义并不大,也不会有多少建设性。在这个延长线上,由长袍发展而来的长衫,由马褂发展而来的唐装、“新唐装”以及各种中式短褂,包括诸如立领、盘扣等一些基本的服饰元素,均是“中式服装”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国际化场景推出的“新唐装”,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设计创制的“中式服装”;2011年4月8日,在上海迪士尼乐园的开工典礼上,米老鼠、唐老鸭等20个迪士尼卡通人物均身穿“新唐装”庆祝,这亦可被视为是“中式服装”走向国际化的再一次努力。

中国大陆的民间儒学实践者蒋庆,经常身穿一款中式对襟装,这种在汉服运动看来属于满装或胡服的装束,在蒋庆本人看来,却有着明确的中式属性。显然,除了有组织人为进行的建构实践,重要的还有一般民众的日常穿着实践。曾经在民国时期市民社会中由普通民众的穿着实践而自发形成的现代旗袍,亦是海内外公认的具有代表性的“中式女装”,并且以此演绎出来的各种时尚裙装,均可视为是“中式女装”的新发展。关于旗袍,以上海为中心,当前也有很多值得一提的动向,例如:关于旗袍文化的展示活动、推动穿着旗袍的时装表演以及各种形式的群众实践,可谓络绎不绝。2012年11月,湖南高校女生设计的“女书旗袍”,据说还获得了“国家专利”,亦是无数相关实践中的一例。

几乎没有争议的是,由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和国

民党创制并极力建构的中山装,亦被海内外广泛认知为“中式服装”。在此基础上,相继发展出的人民服、军便服、学生服及北京 APEC 会议推出的新中装,习近平 2014 年出访荷兰穿用的小立领中山装等,无一例外地均属于中式。

中国各地方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诸多种类的“民俗服装”(如东北大花袄、江南作裙等),亦当归属于“中式服装”文化谱系。当它们不在国际性场景或语境中出现时,其中式属性一般不会或者不大需要凸现出来,但当它们被置于国际性场景或语境时,其作为民族服装的“中式服装”的属性就会非常自然地得到突显和认可^[24]。

汉服运动在建构汉族的民族服装时,经常把它和满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的服装予以对举或并置,这在国内多民族文化相互比较的情形下容易理解。但在把汉服升格为中国人的民族服装或所谓“国服”时,即便汉服的权重和影响力可能很大,也不宜排斥其他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中式属性或其成为中式的可能性。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服装生活及其传统的民族服装,往往在具有各民族特色的同时,也程度不等地相互影响,并且也和汉文化之间有一定的交流,例如:即便是在清朝,作为统治民族的旗人女性,也曾“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截作短衣裳”。在多民族文化大繁荣的中国当前社会现实中,不能因为满目皆是少数民族的民族服装展示和表象,而忽视了少数民族服装生活的另一个重大的现实,即他们固然经常穿着被国家或汉人及海外的“他者”们所欣赏的民族服装,但实际上,其一般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却是非常积极地接受或模仿内地汉区或都市人最常见的短衣西裤,或直接将其称为汉族服装,或认为这样穿就较为时髦、体面或具有现代感。

百度汉服吧的前吧主溪山琴况在生前接受“国际在线文化”频道的采访时,曾将汉服和华服作了区分,他认为:汉服指汉族人的民族服饰,华服则可被定义为“中华的服饰”,是中华民族传统服饰的总称;显然 56 个民族的服饰皆可归入此类,汉服复兴者们对此并没有太多异议;汉服属于华服系统,但因为汉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的地位,汉服很自然地成为华服系统的核心、主流和代表。若是按照这个逻辑,将汉服和各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均包括在文中所重新定义的“中式服装”概念之内,应该可以被汉服运动所接受。如果一定要追问满装与汉服,孰堪“国服”之重任^[25]? 则可以说它们都有资格成为“中式服装”。总之,以宽阔的胸怀重新定义“中式服装”,用扩容的“中式服装”概念将各少数民族

的服装文化也涵盖于内,例如:中国回族服装、中国藏族服装等,它们之具有中式的属性亦应没有问题。笔者认为,在这样的“中式服装”框架或体系之内,既可以有汉服所坚持的右衽,也可以有一些少数民族的左衽,似乎也不是多么严重的问题。事实上,也只有这种较为开阔的思路才能够有助于为多民族国家民族服装或所谓“国服”创制的无解局面开拓出可能的前途。

重新定义“中式服装”的概念,有助于对中国绝大多数民众的服装生活和日常穿着实践拥有较为基本和准确的把握。对于如此具有包容性的“中式服装”概念,当然需要有较为宽泛的理解,而不需要斤斤计较于各种琐碎的细节。如此的“中式服装”概念,可以将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直至当下几乎所有涉及“中式服装”建构的文化动向均予以概括,从而极大地消解上述诸多人为建构与一般民众服装生活之间的张力关系。在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里,各界人士所理解和穿着的“中式服装”是非常具有多样性的。如对襟式样的短袄,它固然经常被定义为唐装或“新唐装”,但其实它的变体很多,至于领子、肩部、纽扣、布料、纹样等很多细节更是五花八门,以至于还有所谓“华服时装化”之说^[26],台湾地区所谓的“五四衫”亦是其例之一。长期以来,海峡两岸的服装设计师们孜孜追求的理想,无非就是将中国文化的某些元素或符号融入西式时装之内或者相反,由他们推动的“中式服装”的国际化、时装化发展,往往并不拘泥于某一类固定的服饰款式或元素,而是从中国上下几千年的服装史、从数十个民族服装的巨量资源宝库中汲取的。

在当代中国社会,动员了传统文化的诸多符号资源,并且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的汉服运动的建构实践是伟大的,但它的理论言说却逐渐地走向了“复古”、内向和封闭的自我循环。汉服运动若要为中国社会及文化的发展做出更有建设性的贡献,如何走出这种理论困局便是一个难题。希望扩容的“中式服装”概念,有助于汉服运动的理论家们深思这一运动未来的走向。

对于以汉服为载体所试图承载的诸多意义,并不是越繁多越好,越古老越好,越纯粹越好。汉服运动早期的导师溪山琴况曾经认为:假如没有像汉服这样的文化形式,中国传统文化就失去了载体。这种观点归根到底,只不过是服装中包含着礼制和某些微言大义这一中国文化政治的传统思想在当代的一种遗留性反映而已。相对于那些在上古时可能确曾附会于服装之上的意义,汉服在当代社

会实际的功能,包括物理、审美、象征等,更值得汉服运动的理论家们去思考。即便是那些看起来确曾有过的传统性的意义,其实也都是需要在现当代的社会生活中予以重新确认和重新阐释的。因此,汉服和汉服运动与其执着去上古追寻意义,不如反问所建构的民族服装在现当代能够承载何种意义。有学者指出,通过汉服来复兴传统文化,与通过恢复私塾或强迫孩子读经以复兴国学一样,是不得要领的^[27]。这是由于汉服作为一种载体或符号与其承载的内涵或象征的意义之间,并不存在永恒、本质以及必然性的对应关系。

无论对于民族服装或“国服”的人为建构多么声势浩大,多么冠冕堂皇,多么美轮美奂,都不应该忽视服装最终的穿着者,即普通的民众。如果只是要复活一套汉人的民族服装,无论是作为礼服,还是作为日常起居的常服,至关重要的除了同袍们持之以恒的穿着实践,对于普通民众的服饰民俗也理应予以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忽视普通民众的服装人为建构,很容易沦为只是爱好者的个人趣味。即便汉服真的不那么实用那又如何?但汉服运动若像汉服吧的吧主“冀人行”“东岳帝君”所解说的那样,是要把汉服及其承载的意义落实在人民生活当中,即改变人民的生活方式,实现衣冠、礼乐、生活三位一体的复兴,那就更没有理由不去重视研究广大民众的服饰民俗了。

(续完)

参考文献:

- [1] 郝时远. 关于中华民族建构问题的几点思考——评析“第二代民族政策”说之五(下)[N]. 中国民族报, 2012-05-11.
- [2] 段京蕾. 汉服复兴:一种民族文化的自觉[J]. 中国新闻周刊, 2005(36):47.
DUAN Jinglei. Han clothing revival: a kind of consciousness of national culture[J]. China Newsweek, 2005(36): 47. (in Chinese)
- [3] 杨娜. 汉服归来[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245-263.
- [4] 张梦玥. 汉服略考[J]. 语文建设通讯, 2005(3):15-16.
ZHANG Mengyue. A brief examination of Han clothing [J]. Language Construction Communication, 2005(3): 15-16. (in Chinese)
- [5] 李战洲. 时尚婚展上汉服成寿衣,汉服发展问题再引争议[N]. 华商晨报, 2006-08-11.
- [6] 张跖. “汉服运动”:互联网时代的种族性民族主义[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9, 28(4):65-71.
ZHANG Qian. "Han suit movement": racial nationalism in

- the internet age [J]. Journal of Chinese Youth Social Science, 2009, 28(4): 65-71. (in Chinese)
- [7] 张太凌. 唐宋八大家“后人”着汉服聚会, 网友称拼祖宗[EB/OL]. (2012-05-17) [2017-11-17]. <http://news.cntv.cn/20120517/111750.shtml>.
- [8] 周星. 本质主义的汉服言说和建构主义的文化实践——汉服运动的诉求、收获及瓶颈[J]. 民俗研究, 2014(3): 130-144.
- ZHOU Xing.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lothing and the cultural practice of constructivism-demands, harvest and bottlenecks of Han suit movement [J]. Folklore Studies, 2014(3): 130-144. (in Chinese)
- [9] 史伟, 董毅然. 我们为什么加入汉服运动[EB/OL]. (2005-07-27) [2017-11-17].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634ad40100mct0.html.
- [10] 李肖肖, 黄玉敏. 开封庙会上网友走上街头秀宋装(组图)[EB/OL]. (2007-04-20) [2017-11-17].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11b4d31010007jo.html.
- [11] 罗雪挥. “汉服”先锋[EB/OL]. (2005-09-5) [2017-11-17].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efe986010167zd.html.
- [12] 阎步克. 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M]. 上海: 中华书局, 2009: 21.
- [13] 佚名. 唐风婚礼现京城, 加拿大新郎迎娶北京新娘[EB/OL]. (2009-05-10) [2017-11-17]. <http://bbs.voc.com.cn/topic-1910067-1-1.html>.
- [14] 张晓帆. 汉服婚装展演引发论战[EB/OL]. (2006-08-17) [2017-11-17]. http://www.99wed.com/fad_wedding/content.php?ID=9281.
- [15] 鲍怀敏, 安继勇. 汉服的特点与流行性分析[J]. 济南纺织服装, 2010(1): 14-16.
- BAO Huaimin, AN Jiyong. Characteristics and epidemic analysis of Han suit [J]. Jinan Textile Clothing, 2010(1): 14-16. (in Chinese)
- [16] 周星. 汉服运动: 互联网时代的亚文化[M]//郭宏珍. 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第七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48-63.
- [17] 张东辉. 从北京 APEC 新中装说开去[EB/OL]. (2014-12-05) [2017-11-17]. <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4/1205/c1004-26151419.html>.
- [18] 吴杉杉. 解读习近平穿中式礼服参加荷兰国宴(图)[EB/OL]. (2014-03-24) [2017-11-17].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3-24/5983295.shtml>.
- [19] 谢维, 高星. 习近平主席夫妇参加荷兰国宴, 着装尽显“中国范儿”[EB/OL]. (2014-03-24) [2017-11-17]. <http://bj.people.com.cn/n/2014/0324/c233086-20840937.html>.
- [20] 王惠琴. “汉服”与“国服”[J]. 艺术设计研究, 2008(1): 39-41.
- WANG Huiqin. "Han suit" and "national costume" [J]. Art and Design Research, 2008(1): 39-41. (in Chinese)
- [21] 王达三. 慎言“汉服”, 多提“国服”[EB/OL]. (2007-03-12) [2017-11-17]. <http://www.docin.com/p-1020740627.html>.
- [22] 赵小侠. 美国万圣节“推歧视中国人”服饰引强烈不满(图)[EB/OL]. (2012-10-26) [2017-11-17]. http://news.youth.cn/gj/201210/t20121026_2552623.htm
- [23] 吴秀杰. 文化保护与文化批评——民俗学真的面临两难选择吗? [J]. 河南社会科学, 2008(2): 16-20.
- WU Xiujie. Cultural protection and cultural criticism-does folklore really face a dilemma? [J]. Henan Social Science, 2008(2): 16-20. (in Chinese)
- [24] 周星. 新唐装、汉服与汉服运动——二十一世纪初叶中国有关“民族服装”的新动态[J]. 开放时代, 2008(3): 125-140.
- ZHOU Xing. New Tang suit, Han suit and Han suit movement-the new trends of "National Costume" in 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21th century [J]. Open Times, 2008(3): 125-140. (in Chinese)
- [25] 冯玲玲. 满装与汉服——孰堪“国服”之重[J]. 作家, 2008(9): 258.
- FENG Lingling. Manchu suit and Han suit-which is the weight of "national uniform" [J]. Writer Magazine, 2008(9): 258. (in Chinese)
- [26] 华梅. 华服时装化[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5-07-19(7).
- [27] 卢新宁. “复兴汉服”合时宜吗? [EB/OL]. (2007-04-17) [2017-11-17]. <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7/49165/5622225.html>.

(责任编辑: 卢杰, 邢宝妹)